

# 中英档案中的九世班禅赴印考

## ——以鄂康诺的侵藏主张和活动为视角

梁忠翠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英国外交部档案显示的九世班禅未经清廷同意便前赴英属印度访问一事, 远非中国档案呈现得那么简单。从中英档案来看, 九世班禅赴印与热衷于英国侵藏事业的鄂康诺的运作有极大关系。自十三世达赖出逃, 鄂康诺便努力培养与九世班禅的联盟关系。中方档案多强调年少无知的九世班禅为英国侵藏急先锋鄂康诺所胁迫; 英方档案则披露, 九世班禅亦曾表明不愿受制于拉萨, 有寻求外力之意。鄂康诺赚取了九世班禅的信任, 并力主高度重视这张“王牌”的价值, 以为英帝国赢得涉藏权益。班禅当时的外向之心似乎只是一时糊涂, 然而, 眼见清廷日暮途穷, 加上受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俄国早有接触的影响, 九世班禅有寻找新靠山的想法亦未尝不存在。此次英方运作下的西藏宗教领袖不经中央政府允许便离境外向的先例, 是英国标立笼络西藏政教上层新模式的一次尝试。无论九世班禅后来的思想如何变化, 这段历史不容人为地回护或“修饰”。

**关键词:** 九世班禅; 鄂康诺; 西藏; 印度

中图分类号: K252; K561.4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699(2014)01-0066-10

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7月, 在荣赫鹏侵略军的进攻下, 十三世达赖喇嘛逃离拉萨, 使英国欲与达赖直接联系、攫取侵略权益的阴谋失败, 英国人继而将目标投向九世班禅系统。英国外交部档案中显示的九世班禅未经清廷同意便前赴英属印度访问一事, 与中国史料和故有的相关论著存在明显不同。<sup>①</sup> 国内论著多强调此时的九世班禅年少无知、受英方恐吓和诱骗。但据英方档案记载, 九世班禅与鄂康诺<sup>②</sup> 有

收稿日期: 2014-01-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更迭与国民政府治藏政策演变轨迹研究”(13BMZ032)

作者简介: 梁忠翠(1983-), 女, 山东菏泽人,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关于1905年11月至1906年2月九世班禅喇嘛赴印, 已有研究成果包括房建昌的《第九世班禅喇嘛对印度的访问——清朝官方文献与英国外交秘密档案及其他私人记载比较研究》, 以及伍昆明的《英印政府分裂中国西藏的阴谋与九世班禅赴印》。房建昌先生从中外档案史料比较的角度, 对班禅此行作了考述, 长于对史料的辨析; 伍昆明先生根据英国外交部档案, 对于班禅赴印予以揭示, 认为九世班禅赴印是受英人诱骗之故, 赴印是一个错误, 并不影响他后来成为西藏僧俗民众反帝国主义的杰出代表。参见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荣新江、李孝聪主编的《中外关系史: 新史料与新问题》一书中房建昌所撰《第九世班禅喇嘛对印度的访问——清朝官方文献与英国外交秘密档案及其他私人记载比较研究》一文, 以及《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刊发的伍昆明所撰《英印政府分裂中国西藏的阴谋与九世班禅赴印》一文。

② 弗雷德里克·鄂康诺(W. Frederick O'Connor, 公元1870-1943年), 又译“奥康纳”“卧克纳”等。大贵族家庭出身的鄂康诺就读于英国查特豪斯公学和伍尔伍奇皇家陆军军官学校, 20岁从军, 24岁来到中国西藏边境, 曾参加镇压英属印度西北边境的反英起义。鄂康诺是名卓越的军人, 29岁升为上尉, 被任命为克什米尔炮兵队军官, 也在阿富汗和新疆等地负责情报搜集工作。33岁的鄂康诺以秘书兼藏语翻译的身份参加荣赫鹏侵略西藏的行动, 兼职情报搜集工作, 并在战斗中负伤。青年时代的鄂康诺便受到莱尔的《英国在印度的兴起与扩张》(The Rise and Expansion of the British Dominion in India)、爱德华兹的《在旁遮普边境的一年》(A Year on the Punjab Frontier)和桑顿的自传《罗伯特·桑德曼先生》(Sir Robert Sandeman)等侵略色彩浓厚的书籍的影响, 对英国的扩张事业极感兴趣, 并有志于英国的帝国事业。参见柯曾出版社(Curzon Press)1997年版亚历克斯·麦凯(Alex McKay)所著Tibet and the British Raj: The Frontier Cadre 1904-1947一书第83-84页。1904年, 鄂康诺成为首任英国江孜商务代办(The British Trade Agent in Gyantse)。1904年10月~1905年12月、1906年12月~1907年8月, 鄂康诺两度任此职。

着某种程度的联系。九世班禅赴印之所以成行,与鄂康诺的运作有极大关系。

英印军队撤离西藏后,鄂康诺留驻江孜,担任商务代办。精通藏语的鄂康诺是一名顶尖的情报专家,他曾探知沙俄对西藏的野心及派密使赴拉萨会面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信息,强烈建议英印总督寇松采取紧急对策。“自达赖喇嘛出逃,鄂康诺及其追随骨干官员便努力培养与班禅喇嘛的联盟关系,(因为)他那时看起来是唯一一位有足够权利来统治西藏的人,或者至少能够统治与英属印度临近的地区。”<sup>[1]35</sup> 鄂康诺认为班禅“在日喀则有独立的政权机构,有自己的宫廷和官员、纳税地区甚至对外政策。在许多日喀则人眼里,达赖喇嘛并不是他们的权威领导,僧俗两界都认为班禅才是他们至高无上的宗主”。<sup>[2]</sup> 所以要“抓住现在的有利时机,巩固与班禅喇嘛的友谊,如果需要的话,甚至进而给予津贴和保护他”。<sup>[3]</sup> 鄂康诺的工作密友路易斯·戴恩亦曾预言,班禅喇嘛可能成为印度土邦(Indian Princely)的统治者。<sup>[1]35</sup> 基于此种思想,鄂康诺不断鼓动英国重视九世班禅的价值。鄂康诺及其上司——英国驻锡金政务官怀特合谋,决定借荣赫鹏侵藏余威发力,<sup>①</sup>报请英印政府利用1905年英国威尔士王储访问印度之机,邀九世班禅赴印。

## 一、中国档案中的九世班禅赴印

1905年9月19日,鄂康诺率领数十名士兵由江孜出发,开始了他的阴谋之旅。根据存有驻藏大臣有泰通信官函的档案记载,最先是九世班禅致信拉萨的有泰,称鄂康诺带兵五十余人到达后藏日喀则,自己“不得与伊见面”,“按照去岁稍送礼物,刻下仍住后藏,谅必不日起程”。有泰并没有重视此事,他给九世班禅的回复是,“须待之以礼,不失我佛教之本心为要”。但一月后,班禅系统的汉官——后藏粮务范启荣、都司马友龙向有泰汇报了鄂康诺的真实意图:10月27日,鄂康诺谒见班禅,称印度有一大会,英王储也要去,请班禅于十月赴印相见。范、马得到的信息是,班禅表示须禀报有泰奏知朝廷批准,但鄂康诺以“即称该国有信,不去不行”相对。范、马听说班禅属下的后藏首席大臣札萨克喇嘛率领番官等婉求鄂康诺,但他依旧“声色俱厉”,于是认为鄂康诺“此番要班禅赴印,决无好心。若其不行,势必以兵威抢劫;若冒昧前往,则已堕其术中,将来赵王留秦,又将何以善后”。二人称:“卑职等踌躇再四,靡计克施,面晤该英员,苦口婉陈,亦不见听。惟有据情察陈宪台恳求,一面电达外务部,一面飞咨驻印星使唐大臣,阻不轨之心,以遂番民之愿,则造福实无穷既矣。不然者一生兵衅,后事为艰,且汉边戍卒不过百余人,其势不能相敌。”<sup>[4]33-34</sup>

领教过英人厉害的有泰得此情报,立即明白鄂康诺来者不善,遂告知在印度的清议约大臣张荫棠,要求他转告英印政府,勿使鄂康诺“越礼寻衅在案”。另外,“无如班禅年轻,从未经此恐吓,应仍请贵大臣婉商印督,迅即转饬英员卧克纳不得苦逼班禅,恐生意外之虞,以免大局动摇。”<sup>[4]37</sup> 有泰还告知张荫棠,江孜电局已被鄂康诺控制,有泰只能通过印度电局与北京通信,也只能写信给他。有泰同时令范、马设法开导鄂康诺,“切勿力争,致滋衅端”。

其实在印度的张荫棠已先于有泰探知英印欲诱班禅来印的情报,他早于10月28日即电告清廷外务部,并提议外务部向驻华英使抗议。<sup>[5]1501</sup> 之后,有泰又从札萨克喇嘛商卓特巴处得知,称他们正会商开导鄂康诺,似乎事情并非有急转直下之态。九世班禅还派人详细面禀有泰:“此事班禅主见已定,纵舍生亦不冒险前往”。有泰回应班禅系统官员:“但虑班禅年轻,未及历练,而英员守候催逼,恐其语言恐吓,班禅畏葸,摇摇无主,则不免堕其术中。总之,此事关系全藏安危,无论英员如何催逼,务宜坚持定见,千万不

① 虽然阿历克斯·麦凯之 *Tibet and the British Raj: The Frontier Cadre 1904-1947* 一书显示,“锡金政务官怀特建议邀请班禅喇嘛。鄂康诺一度怀疑此提议是否明智,因为这将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中国会认为这是对其权威的挑战”,但这实际上是鄂康诺欲促使英方向班禅提供支持的借口。

可摇夺,更不必与之相争,以理譬说,使彼无隙可乘,以免另生枝节,是为至要,合亟札伤。”<sup>[6]321</sup>接着,有泰又接到了班禅的保证,称“行止一切必须恪遵大皇帝圣意,并无任意妄行之事。且甲噶尔地方遥远,兼之炎热”,总之“无论如何实不能前往”。<sup>[4]36</sup>看来,截至目前,有泰得到的信息是:九世班禅是不敢违制出境的。

但随之范、马又上报有泰:“班禅当请卑职等在广佑寺中备述苦况,声称我受大皇帝二百余年厚恩,决不忍辜负。此番该英员逼我前往,若不去,恐后藏地方、札什伦布寺院均不能保全;若其去时则我未奉到钦宪批伤,将来大皇帝降罪,必不能宽。惟后藏之安危所系,生灵之性命所关,为我班禅一人致使全局震动,此心实所不安。我拟勉强一行,生死不问。若我班禅自此违背大皇帝恩德,即死在九幽地狱之中不得超生。请烦婉禀钦宪转奏朝廷,谅我苦心则我班禅感德矣。”<sup>[4]38-39</sup>范、马的反应是“闻其所语,不觉涕零。当即回称,此等重大事件,行止去留非我等所能谋及,既难候钦宪批伤,仍请佛爷善自主裁”。<sup>[4]39</sup>

如此看来,九世班禅当为鄂康诺所胁迫,且受胁甚急,毫无转圜。事已至此,班禅赴印几成定局。

惊慌的有泰要求属下确认消息,并再次命令范、马向班禅言明原则:“不准妄开衅端”。但有泰自知无力阻挡,故再请张荫棠“妥商英使,迅伤卧克纳勿得寻衅为要。”<sup>[4]41</sup>此间,商卓特巴等又不断上报有泰,转述鄂康诺的威胁言论。终于九世班禅向有泰表明了最终态度:“我班禅可无忧虑。奈伊逞其兵威,甚属紧迫,暂时不从英国之意行事,不但有玷大皇帝圣聪,且与全藏教局有损。至于扎什伦布寺院及佛尊、经卷、僧人并合藏大众安危,不知出何利害,实属心中难担,焦急莫释。前奉大人赏来译文训示,有优礼相待等因。奉此,是以驻防文武二位及商卓特巴、札萨克喇嘛并所属寺院地方人众,以及昔孜营官二人,将始终利害情形再三开导讫,目应奏文殊菩萨大皇帝之处,自当小心设法办理,俾免有玷天威。至于黄教及合藏大众始终安危裨益之举,只得不顾性命及沿途苦楚,暂行前赴噶里噶达,随伊之意,面晤太子,不得不允迅速前往,并非有意违背。此情务望大人迅速妥为具奏文殊菩萨大皇帝圣聪,并请派随我前赴噶里噶达之大人替身妥员,无论行抵何处,飭令星夜前来;若未到之间起程时,请由后藏文武内准其随带一人,总期行止一切。祈请大人始终裨益之事,迅速示复施行,嗣后应行具文之处,再当陆续具文,请烦在怀。为此,于光绪三十一年番闰九月初六日具信字。”<sup>[4]42-43</sup>此信标志着班禅已下定决心赴印。

得信后的有泰除了重弹老调——“务须以理善说,切勿启衅为要”外,还不留情面直言,“贵班禅须自思身列佛号,世受国恩,宜如何维持黄教,镇慑后藏,仰答高深。且从前历辈班禅出入,均须事前奏闻,奉旨允准,乃能照行。此次即使英员强逼,亦必先请本大臣代奏,俟奉朝命,再定或行或止。若偏听威吓之词前往,若大皇帝天威震怒,治以严罪,贵班禅能当此重咎否?至于派员及带文武事,非奏案,万难照准。相应插翼译咨贵班禅,请烦查照前札札萨克之案,总以未奉大皇帝谕旨为词。且彼称大国,我亦大国,有何分别在内地耶?务设法婉辞英员,毋庸前赴印度。”<sup>[6]323</sup>

接着范、马又传来消息说,11月6日晚,寺内喇嘛传言,如果汉官不陪同班禅赴印,则待其起程,报复汉人。于是范启荣的观点是,“寺中喇嘛不由分辨,仇我汉人,若不同行,必生事故”。<sup>[4]44</sup>有泰接此信息,并未置可否。

至此,鄂康诺和九世班禅一行11月8日顺利启程,22日住宿亚东喇嘛寺,23日毫无悬念地出关。沉耽于笔墨文字游戏的驻藏大臣有泰眼睁睁看着九世班禅离开了中国。

综观有泰在此事中的反应,自始至终强调“若果执意截阻,势必决裂,兵衅一开,藏事将不可收拾”<sup>[7]</sup>的处事原则,足以勾画出晚清昏聩官员的整体姿态。而有泰将此种姿态演绎到了极致:尚且不论鄂康诺来了一个月,有泰毫不作为,就连有泰始知所谓的“威逼”班禅计起,他自始至终只听了班禅、范、马、札萨克喇嘛等日喀则官员的一面之词,丝毫没有再从拉萨派人前去探听其他;而在得知鄂康诺将以兵丁相要挟之际,有泰更是连一兵一卒都未发往日喀则,拉萨与日喀则之间信使通讯倒颇为频繁。

九世班禅已然出关,在其下辖范围内尚无作为的有泰欲了解班禅在印详情,更是只能依赖范启荣的情报,其得知的情況是:

及至印洋,见英太子时,卧克纳令班禅拜跪。班禅未从,当称我只在大皇帝前跪拜,其余不行,仍行执手常礼。是时我印使亦派委员暗视,因班禅未曾折节,心亦喜之。后札萨克喇嘛及番官等稟谒印使(按:张荫棠),印使当责其不应前来,能推缓十日则此事不行矣。该札萨克喇嘛当即回称,卧克纳威逼情形,已请地方文武稟呈两位钦宪洞鉴。班禅恐动兵衅,只得舍命前来,还求大人作主。印使当即回答,班禅如能作主,十七日(按:即公元1906年1月11日)即便起程,不得逗留,使英人另生枝节。如英人强留不允,自有本大臣主持。如虑夫马一切为难,应用一万八千即在本大臣处支用。如临期不走,本大臣则唯尔问之等语。该札萨克喇嘛当叩头谢恩,印使赏赉各番官等亦甚丰厚。并闻我外务部已电达驻印钦使及印督等,班禅来印赴社则可,若逼令干预藏事,即令班禅亲自画押盖用印信,均作为废纸等情。<sup>[4]59-60</sup>

至于班禅很快返藏的原因,范启荣的情报是:“是以班禅此番虽赴印洋,英储及印督等均未得提及公事,始谋未遂,不得不厚礼送归。卧克纳虽有迎接之功,而威逼情形已登报馆,探闻英廷亦未特加奖励,且有糜费国帑,归罪该员之谣。赏该员八阅月假期回英,另委英员百立办江孜事。卑职私衷测度,事似有因,班禅未预议约事情亦似属实。此卑职密查暗访实在情形。途中英人支应每日卢比千元。据各番官面称,此番英人共费银三万余两。卧克纳贪功心切,谋事未成,皆我宪台经犹远大,弭衅无形,合浦珠还,汉番欢忭。卑职访之再四,外无新闻。”<sup>[4]60</sup>综合了九世班禅自己返藏后的汇报,有泰最终认定了班禅赴印之事“尚无不合”。

至于九世班禅返藏过程是这样的:1906年1月9日,札萨克喇嘛正式请求张荫棠代奏朝廷,“未经奏准出境,恐干严谴,沥陈下情,求免处分”,<sup>[5]1507</sup>称要于1月11日由印启程返藏。清廷接此消息,大喜过望,1月12日电令张荫棠:“该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此次前赴印度,并未奏准,擅自出境,实有不合。现已启程回藏,念其情词恭顺,尚属出于至诚,著即准其回藏,照旧恪供职守。”<sup>[8]224</sup>有泰得知班禅返藏,亦是欣喜。为挽回朝廷颜面和重树驻藏大臣威严,有泰计划“兵丁拥送,以昭慎重”,然而班禅在30名戎装英军的严密簇拥下,于1月9日由印度起身回藏,1月23日进关,2月9日回到扎什伦布寺,有泰之派兵壮威计划付之东流。

九世班禅赴印这个时段西藏局势幻变多端:荣赫鹏侵藏结束;中英间印度谈判持胶着状态;十三世达赖喇嘛北向出逃;清驻藏大臣因废黜达赖而在拉萨面临藏人信任危机;西藏汉官内争激烈;清廷对藏局的重新评估。九世班禅竟超乎想象地在短时间内返回驻地,庆幸之余,清政府上下实在没有精力和时间再去深究此事,这段历史似乎可以盖棺封存。

## 二、英国档案中的九世班禅赴印

然而,九世班禅赴印之事远非中国档案呈现得那样简单,通过解密的英国外交部档案,又可以看到另一番景象。

1905年5月15日,驻守江孜的鄂康诺给英印政府的机密信件中称:

5月9日,班禅活佛的一位森本堪布于上午来拜访我。他奉班禅之指示,向我诉说拉萨政府对扎什伦布的态度。他说前几年班禅活佛的权力和圣洁受到拉萨的猜忌,拉萨政府正在逐渐剥夺扎什伦布的几乎一切权力,就在去年还收走了岗巴宗这片广大地区。现在班禅显然受到丧失更多地区和权威的威胁,不过他一直在抵制拉萨政府的要求。然而,他担心达赖回来之后将无力抵抗,除非能获得英方的某种支持。<sup>[9]124</sup>

基于此,鄂康诺询问英印政府可否向班禅许诺,若日喀则同拉萨发生公开冲突,会向他提供道义和物质上的援助。鄂康诺提议利用英王储访问印度之机,请班禅赴印会面,除可向班禅展示英印现代文明、亲

密他与英国的关系外,还可利用班禅签署某种条约,至少可以为印度举行的中英西藏问题谈判增加筹码。在鄂康诺看来,班禅访印利远大于弊。

鄂康诺将这一大胆设想报请英国驻锡金政务官怀特,怀特于6月25日才回复鄂康诺:“你认为,班禅活佛访问加尔各答是否合宜?他是否可能接受邀请?”<sup>[9]377</sup>鄂康诺同日的回信是:

如我5月9日日志所报告,班禅活佛实际上已经请求我们保护,他的首席大臣因此写信给我说活佛打算不久亲自写信给总督。此种情况下,倘若政府准备向活佛做出明确许诺,保护他免遭拉萨方面的报复,我以为我们这边的礼仪,包括邀请他访问加尔各答显然是可取的,如果给予他如上所建议的那样一类保证,他可能会接受邀请。我认为我们的这类保证,足以制止拉萨采取敌视班禅的行动……如果不给予这类保证,而要他以任何明显的方式同我们妥协,那对活佛是不公正的。<sup>[9]378</sup>

在鄂康诺看来,班禅赴印是完全可以办到的,只要愿意满足其条件。

据英档,经鄂康诺周密的部署,尤其是通过班禅系统内部鄂康诺线人<sup>①</sup>的运作,班禅决定邀请鄂康诺到访扎什伦布。9月初,英印政府外交部和怀特对鄂康诺下达了指示,要求鄂康诺接受班禅方面的邀请,并尽可能快地到达那里,但需要向班禅表明,他也要明确一定会接受英印政府的邀请,而且不受清政府的影响才可以。怀特还向鄂康诺指出:一则应向班禅表明,这将对他有极大好处;二则可提及他在日喀则的处境。

9月8日,已有成熟运作计划的鄂康诺致电怀特,称接到政府的书面指示后将立即动身前往日喀则,并请求对以下问题作进一步指示:“1. 班禅肯定会问及邀请他抵达加尔各答的时间,大概需要他何日抵达? 2. 我认为他希望按自己的意愿携带随员,因为他旅行总是有大批随员陪同。3. 我将努力劝阻他询问北京,那是他所希望的,而不是我;但是如果他希望询问,是否允许他用我们的电报电告中国皇帝? 电报将使用明码。4. 如果他接受邀请,在正式邀请来到之前,我是否应留在日喀则……只有我在日喀则才可阻止来自拉萨的迫使班禅改变主意的威胁。”<sup>[9]379</sup>

次日,针对鄂康诺的问题,怀特回复称:

在班禅明确决定他将接受邀请前,印度政府不打算发出任何邀请,也不会向北京提出任何有关班禅访问的建议。你须向班禅明确:如果可能,他应接受邀请,无需向中国作任何询问;如果接受邀请就不能改变,无论如何不必取决于向北京的询问;他及时得到北京答复的唯一方式是通过我们的电报,且是明码,因为他得不到中国密码,而请驻藏大臣帮助是不合适的。你须强调班禅接受邀请肯定对他有利,印度政府并不强迫他接受邀请。关于访问日期,印度政府8月3日称将在亲王殿下访问期间(约持续十天左右),以后将给出确切日期。现在给出的亲王殿下访问计划的官方日期是1905年12月29日至1906年1月6日,因此班禅应在12月底到达加尔各答……至于班禅随员人数,我认为应尽可能压缩到最少为好,因为在加尔各答为全体随员提供住宿将很困难。请查明他旅行可以接受的最少人数。并请报告,班禅随员中有哪些大活佛或贵族。<sup>[9]380-381</sup>

可见怀特特别强调班禅赴印的秘密性,以及英方不承担责任的态度。

怀特最后还附上一封致九世班禅的问候信,并希望鄂康诺将事情全部解决后再返回江孜。

9月19日,鄂康诺率领一支卫队由江孜出发。据其工作日志显示,一路都受到日喀则方面的热情欢

<sup>①</sup> 据阿历克斯·麦凯的 *Tibet and the British Raj: The Frontier Cadre 1904-1947* 第25页:“或许鄂康诺获得的最具价值的线人就是班禅喇嘛,他与江孜商务代办通过‘石板’信——一种西藏较为普遍的秘密通信方式,保持秘密联系。这种信写在石板上,委托给可靠的送信人,若信件被错误地传递的话,送信人能够迅速将上面的文字消掉。”

迎和友好接待。<sup>①</sup>

约两个月后,11月23日,在成功地使班禅一行浩浩荡荡离开中国边境之日,鄂康诺给怀特发了一封详细的机密信件,信件显示他开始有所顾虑:他担心班禅此行会“冒犯他的中国施主”,也可能遭到拉萨方面的对抗,因为之前他并未向班禅提及可能的严重后果。而且他自己清楚地认识到,“西藏的领导人,包括班禅,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国宗主国的恩典”。<sup>②</sup>“虽然中国在西藏的权力可能是一种虚幻,但他们的特权和政治伎俩是实实在在的……不经中国皇帝或驻藏大臣的同意,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各处殿堂”。所以鄂康诺得出:“基于以上事实可知,班禅没有事先得到中国正式批准就接受邀请访问加尔各答,将违反他的前辈们所遵循的历史传统,因此他返回日喀则时若无法寻求印度政府支持,就要承担一定的毁灭性的政治风险。正如我之前所说,若不经皇帝事先御准就进行访问,驻藏大臣有权对班禅喇嘛及其首席大臣实行废黜。”况且“班禅当时接受到加尔各答的邀请,也明白这就包含有一种允诺,即我们帮助他抵抗拉萨的报复”。<sup>[9]310-312</sup>

鄂康诺强调向班禅提供支持的必要,但同时他又明白,“至于作为允诺的支撑,需雇佣军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sup>[9]124</sup>

为消除英印政府的顾忌,鄂康诺乐观地分析道:“我认为拉萨无论有任何行动,我们均不要大加干预……我并不以为拉萨真能严重伤害他……中国不会把班禅未经皇帝御准,就对印度进行友好访问、参观佛教圣地、会见威尔士亲王夫妇和总督阁下看作一种严重罪过。”<sup>[9]312</sup>为对抗清政府在班禅返藏后可能采取不利的措施,鄂氏甚至提出了更具野心的建议:

我认为居第一位的必要条件是我们不应在江孜而应在日喀则设置委员。在日喀则地方驻有一名委员,就能触摸到那一地区的政治脉搏,也可在事情未引起太大注意之际就对之了如指掌……我准备以事实和数字来证明,日喀则在商务上远比江孜更为重要。

因此我认为,此一步骤可保证班禅喇嘛及其当局抵抗任何实际侵犯。不过如果我们使他失去了中国人的支持和利益,那么我们就应努力补偿相等的利益。首先,这些利益要有一个高级的模式,其次要有若干物质上的补偿,诸如每年(给班禅)津贴和种种礼品。

还剩下一个问题:我们将班禅喇嘛置于我们保护之下而取得的政治利益,是否值得大加花费。显然在拉萨当地设置一名委员,才是我们要抵制外国在西藏的阴谋的唯一真正保证。如果做不到这

① 鄂康诺赴藏详情为:9月21日,鄂康诺一行扎营于距日喀则约10英里处的冲准村。在此等候的老朋友岗巴宗本带来了班禅和后藏首席大臣的哈达,鄂康诺回敬哈达后,岗巴宗本便骑上马去报告班禅。22日,鄂康诺骑马前往日喀则,称在各处都受到村民的厚待和礼遇,村民的头人指给他们最方便的路和溪渡渡口。在距日喀则两英里处,两位日喀则宗本前来迎接。再前行半英里,鄂康诺见到了搭好的帐篷,班禅的两位仲译和其他官员用酥油茶等款待他们。此时,三名汉兵正好在镇口遇见鄂康诺一行,他们带来了清驻扎什伦布寺汉官的请柬和问候。鄂康诺抵达后,两位宗本和扎什伦布寺的大尼仓前来拜望,带来了粮食、酥油、茶叶、佛挂以及很多其他礼品。傍晚时候,大尼仓来访,同鄂康诺一起喝茶,他对鄂康诺的到来非常好奇,鄂康诺表示只是对班禅的一次礼节性的访问。23日中午12时,后藏首席大臣札萨克喇嘛带了一些礼品前来拜访鄂康诺,双方正式会谈了约半小时。鄂康诺告诉札萨克喇嘛,他再次来日喀则是进行礼节性拜访的,请他安排会见班禅的时间,札萨克喇嘛回答说24日中午合适。札萨克喇嘛还询问了鄂康诺威尔士亲王访问印度的事项,以及日喀则到大吉岭、大吉岭到加尔各答的距离等问题。但23日晚,班禅将在后藏首席大臣家中拜访的鄂康诺的线人萨顿活佛叫去,急切地想知道鄂康诺走访日喀则的真正原因。萨顿活佛告诉班禅,鄂康诺到来的真正目的是邀请班禅访问加尔各答,而在英印总督发出邀请之前,他们要弄清班禅对此事的真实想法。在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后,两位活佛和札萨克喇嘛均表示,不管清廷意见怎样,他们愿意接受邀请,然后会与鄂康诺磋商,不过他们希望目前对整个事情绝对保密。为掩人耳目,鄂康诺第二天对班禅作了一次正式的公开拜访。9月24日约12时,鄂康诺骑马来到班禅消夏的寺院。他们受到了班禅一如既往的最周到的接待,鄂康诺赠送给班禅照片和画册,班禅表示很喜欢这些东西。班禅询问鄂康诺自己到加尔各答时印度总督在何处等问题,二人寒暄了几句后告别。但在离开前,鄂康诺又前往札萨克喇嘛处,二人交谈了几分钟。下午,班禅的叔叔和另外两三名官员来拜访鄂康诺,送来粮食、面粉等礼品。晚上,萨顿活佛再次会见札萨克喇嘛,听取他和班禅拟议中的走访加尔各答事宜的细节问题。

② 如鄂康诺指出:达赖、班禅和西藏所有高级官员均经中国皇帝御准任命,不经皇帝御准,则全无效。他们的权力直接取决于皇帝的恩典,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驻藏办事大臣和中国驻藏其他官员,清帝既能御准一项任命,也能撤免官员。除此之外,达赖和班禅每年一些时刻,均从清廷接受很有价值的礼品,如绸缎、金银和景泰蓝等,这些东西用于寺庙和佛像的装饰以及僧俗人等的衣服和装饰品。

一点,我们所能希望的最多也就是保住与印度毗邻的西藏那一部分地区,不让外国势力侵入。仅在江孜设置一名委员达不到此目的。江孜只不过是一处小商业地,并非政治要地。该处委员不能同西藏领导人接触,除了借助于那些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密探,甚至也无法弄清拉萨和日喀则所发生的事情。然而在日喀则情况就不一样了,无论如何英国委员驻留在那里便能保证后藏摆脱令人讨厌的阴谋。这一点至少会是一项本质性的收获,且使我们能有效地挫败来自俄国的任何急进攻策……代价是无足道的,由于我们威望日增,必须的花费会减少。

总而言之,可将我们在西藏采取的政策大致表述如下:抓住目前的有利时机,加强我们同班禅的友好关系。若有必要更进一步,就收买和保护他。根据《拉萨条约》条款,在日喀则开辟一处新的商埠,将使外国在拉萨的任何阴谋都会因为我们在后藏和南藏势力的发展而受阻,而做到所有这一切均无需公开指责和破坏中国的宗主权。<sup>[9]312-313</sup>

班禅甫一出境,鄂康诺便生出了变班禅驻锡之地日喀则为英国据点、进而向拉萨进发的设想,不可谓不急进。

鄂氏报告最见其心迹的是信件最后部分:“事实上,现在我们手中有一张王牌。如果想要利用手中的机会,我们就应当加深班禅喇嘛及其下属对我们的慷慨大方和强大威力的印象,我们就可能做到以小代价赢得班禅喇嘛的感情和信赖,这胜过我们花费千百万去打贏战争、缔结条约、部署防军所能获得的东西。”<sup>[9]314</sup>这同时也表明了鄂康诺对英印政府接待班禅方式的建议。<sup>①</sup>

班禅一行12月3日抵达印度加尔各答。他的来访引起印度报纸的极大兴趣,他们称班禅来印并非仅为迎会英国王储,而是“别有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时在印度的清政府亚东关税务司英人文森特·韩德森对班禅的行踪持怀疑态度。他1906年1月12日向清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的报告中称:“班禅在威尔士亲王访印时成了印度政府的客人,并被尊为贵宾。对他的称呼是‘尊贵的殿下’,欢迎时鸣礼炮十七响,由总管贴身保镖护卫,乘四匹马的马车,等等。亲王本人亲自回访,有专列随时供他使用。现达赖喇嘛正在返回西藏的途中,除非班禅恢复其原有地位而退居札什伦布寺,否则西藏很可能出现严重的骚乱。班禅声称,他与印度政府并无政治交涉,我却不能相信。他经常拜访总督,而印度政府政务官员终日进出其下榻的黑斯廷斯公馆,并派遣声称是其札萨克的人送一封信至张荫棠先生处,保证并表示他此次赴印系被迫前来,请张先生向外务部解释。”<sup>[10]978-979</sup>

明托夫人的日记也非常详细地记载了班禅的行程。<sup>②</sup>

关于班禅在印度是否谈及政治事务,亦可从1906年1月16日明托致新任印度事务大臣莫利的信件中窥得一二:

本月10日,我接待了班禅喇嘛的私下拜访,他想要提出三点请求,即:(1)请我写一封信函给他,允诺在拉萨当局或中国人采取敌视态度的情况下,向他提供某种援助;(2)他如果受到攻击,请借给他若干武器;(3)请求向我们驻江孜的官员下达指示,要他们保持同他的现有的友好关系,转送他的

① 此时他描绘了班禅的巨大影响力:可以丝毫不夸张地说,班禅喇嘛行走在西藏所激发的如此大的激情和尊崇,有如基督再现于欧洲居民。正如我们在圣经中所看到的,人们挤满房顶要看基督一眼,挤上前去要摸摸基督的衣裾,这些淳朴的佛教徒尊崇班禅本人及其物件,也是一模一样。班禅行走在西藏,在我看来是人们宗教信仰的感情之深重和感情之纯真的一次绝妙的显示。当班禅的轿子出现在视野中之际,人群中的妇女变得完全如痴如狂了,尊崇与敬畏交织,感激涕零,泣不成声。人群你推我挤,抢着要争得一份殊荣,即他们低着的头去触一触班禅喇嘛的马饰缨穗、轿子,甚至班禅的行装和物件。行进中所发生的唯一困难,是因下春丕居民的忌妒而发生的,因为班禅喇嘛留宿在上春丕的林马塘,而未能留宿在下春丕。他们拜倒在我面前,恳求让班禅哪怕只是在那里留宿一夜。由于政府的命令,我不得不拒绝他们的请求,他们则干脆拒不提供夫马。只是经过劝导,说如此行事对班禅本人造成不便,他们才提供了必要的夫马。

② 参见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荣新江、李孝聪主编的《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一书中房建昌所撰《第九世班禅喇嘛对印度的访问——清朝官方文献与英国外交秘密档案及其他私人记载比较研究》一文第444-445页。

信函;他还请求,允许在必要的情况下,由特别送信人将信件送到印度。我回答班禅喇嘛说,英国政府与中国政府曾经就他礼节性访问印度的问题交换过信件;并且告诉他,只要不讨论公务,中国政府就不会提出反对意见。因此中国政府不大可能因他到印度访问,而对他有敌意;他本人在他回到西藏时,无疑会采取机智而正确的态度对待之。万一中国对他表现出敌意,我相信,我们老练的官员会尽力为他同中国政府交涉的。至于他请求提供武器的问题,我指出绝少有意外事件,并且说我们目前不能考虑此事。至于他的第三点请求,我说这是完全合理的,将会下达他所希望的那层意思的指示,不过,在平常情况下,驻江孜商务委员会是最好的和最快的联系渠道。

班禅喇嘛自称感到完全满意。印度政府指示驻江孜商务委员保持同他的友好关系就足够了,驳回了他要给他一封信函的请求。我提醒他,他说过他会为他重新回到日喀则而高兴,也为因他到印度访问加强了同英国人的友好关系而高兴。我表示,希望他作为西藏的最高宗教权威,能对西藏人施加他的最大影响,以加强目前愉快进行的友好关系。班禅喇嘛回答说,他会永远为此尽力而为。<sup>[9]318</sup>

很明显,这些与范启荣和班禅的禀报相左。

至于班禅很快返藏,中英档案较为一致。但是班禅返藏后是否如其所称,将“恪守清规,梵修功行,竭力振兴黄教,务尽厥职”,<sup>[8]224</sup>却不尽然。事实是,班禅不但与英国的情愫未了,且双方关系有所加强。

张荫棠在1906年11月9日致外务部电文中说:“然班禅与达赖仇隙已深,班禅久堕英煽惑术中,虽保达赖回藏时不藉端构衅,而英即乘机坐收渔人之利。昨班禅派札萨克来见,语次颇有壮志,恃英庇不讳。”<sup>[5]1475</sup>1907年2月6日,张荫棠又称:“班禅到印京,见英储后,志常鞅鞅,恃英援欲与达赖争权。英哄班禅立为印度等处黄教之主,意实图并吞丕及后藏一带之地。棠日虑达赖回藏后,英人从中调唆构乱,坐收渔人之利。前月班禅两次派员来谒,要求达赖赐伊以喀木湖前辈班禅降生之地,棠唯谕以朝廷恩德,当弃小嫌,同心以御外侮,不宜争私利而分畛域。”<sup>[5]1476</sup>1908年9月,复奏称:“及棠奉命入藏,道经江孜,班禅差札萨克来迎。谈次微露班禅有欲代理达赖之意,棠于是乘机即令转劝班禅呈请来京陛见……当时噶布伦颇为惊惶,以为班禅来京后,达赖必致失位,是以情急,乃电商达赖亦援请陛见。”<sup>[11]</sup>

在英国外交部档案中,亦可见这番光景。1907年1月,鄂康诺的工作日志中显示:“27日,我接到了班禅喇嘛的一件私人信函,其中说,他在拉萨的代理人刚报告说,……张(荫棠)先生说中国人将来不会允许任何英国官员访问扎什伦布。班禅喇嘛渴望知道这是否真实。我通过他的送信人予以回复,大意是,英国官员访问日喀则是执行英国政府的命令。”“28日,班禅喇嘛的常驻拉萨代理人今天从春丕谷到达江孜。他前来拜访,我们进行了短暂的谈话。他主动表示,假如班禅喇嘛同意,他完全愿意定期地向我提供从拉萨来的情报。”<sup>[12]</sup>

从中英档案来看,自十三世达赖出逃,鄂康诺便努力培养与九世班禅的联盟关系;鄂康诺成功地获取了班禅的信任,而班禅也曾表明他不愿受制于拉萨。鄂康诺对待九世班禅之手段不外乎武力威胁与权力引诱,诚如伍昆明先生所言:“此次怀特、鄂康诺及印度寇松政府策划诱骗班禅赴印等一整套培植亲英头目作为其傀儡,从而实现英人控制和分裂西藏的方法,是英属印度政府过去侵略西藏及其周边小邦所惯用的。”<sup>[3]90</sup>再者,鄂康诺之所以能够促成此事,与其个人素质有关。其一,鄂康诺刚参加了荣赫鹏率领的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在战争中表现出了英国所需要的合格的边境官员的特质——“精力充沛,坚韧不拔……强烈的责任感”<sup>[1]84</sup>等,并“在战斗中证明自己的勇气”,<sup>[1]79</sup>赢得了看重边境官员军事经历的英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况且鄂康诺在战争中负了伤,更表现出他对帝国事业的“奉献”精神。其二,鄂康诺是其时英国方面对西藏较为了解的人。韩德森曾于1905年如此评价鄂康诺:“他研究西藏及其风土人情已有十二年之久,甚适于这一职位,他的藏语很好,对当地人及地区既表同情又感兴趣”,“鄂康诺自有他自己的手法,结果获得了印度颁发的帝国勋章(C. I. E.)”。<sup>[10]970</sup>鄂康诺的后学、“西藏通”黎吉生称鄂康诺“亲善



和精通藏语,给西藏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sup>[13]</sup>

另外,在英内阁及藏务主要负责人调整之前,印度事务大臣布罗德里克、英印总督寇松和锡金政务官怀特均持积极的“前进政策”。早在 1903 年 1 月,寇松便宣称,“所谓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乃是一种章程上的虚构,一种政治上的矫饰——这种政治上的矫揉造作,只是为了双方的方便而维持的”。<sup>[14]</sup> 1904 年 10 月 3 日,布罗德里克在致寇松的电文中说:“荣可朋奉行中央政府之训令,以议藏约。统言之,能得中央政府之嘉许。”<sup>[15]</sup> 而“傲慢、偏执、小气、自私……着迷于自己的名利”的怀特更喜欢锡金,并将此地作为自己的封地,<sup>①</sup>对于西藏则不愿亲自前往,而是令江孜的鄂康诺办理,这就为鄂氏施展其计划提供了机会。

再者,即使英方政府对要求班禅赴印持模棱两可态度,但“早期商务代办,因为边境问题没有解决,使他们有可能进行潜在的扩张,‘不断地发现向西藏前进的合理理由’”。<sup>[16]</sup><sup>84</sup>

当然,从中国方面来说,清政府江河日下,边务松弛亦非一日,已丧失了对边境宗教领袖的威严。再加上驻藏大臣有泰“徒有办事之名,几同守府,遇事掣肘,莫能过问,为人轻视”。对于鄂康诺的种种劣迹均无切实应对办法,只得任其发展,也使鄂康诺钻了空子。

鄂康诺虽使九世班禅赴印,但是很难说他在此事上取得了成功。因为很快英国政府和英印政府便将目光转向了十三世达赖喇嘛,他们认识到:“西藏世俗事务的统治权却属于达赖,而班禅在这方面处于从属地位,因为西藏划分为约五十个地区,他仅控制其中的三、四个地区,而且他所占据的地区也在达赖喇嘛的管辖之下。日喀则镇距于扎什伦布只有半英里,仅次于西藏最大城镇拉萨。日喀则连同其周围的重要地区均在达赖喇嘛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非班禅管辖的地区之一。此外,达赖谱系先于班禅谱系,班禅的寺庙扎什伦布系一世达赖所建。十三世达赖比班禅年长,实际是班禅宗教上的领路人。”<sup>[16]</sup><sup>51</sup> 而且他们发现达赖“是一个机灵的行政官员,而不是个超尘修行的僧侣”。<sup>[16]</sup><sup>79</sup>

“班禅此次不经奏准赴印,并将与前藏矛盾诉诸英人,请他们帮其抵御前藏的压迫,无疑是错误,因按条例他不经驻藏大臣是不能与外国通信和交往,不经奏请皇上批准是不能擅往外国的,更不能求助于外人来解决西藏内部的事务和纷争。否则,不仅违犯了善后章程 29 条等有关规定,而且极易被虎视眈眈的英人所利用。”<sup>[3]</sup><sup>90</sup> 班禅此时外向之心似乎只是一时糊涂。然而,九世班禅眼见清廷日暮途穷、风光不再,加上受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俄国早有接触的影响,有寻找新靠山的想法亦未尝不存在。九世班禅赴印成行既彰显了英国边境官员的巨大能量,亦是英国标立笼络西藏政教上层新模式的一次尝试。无论九世班禅后来的思想如何变化,这段历史不容人为地去回护或“修饰”。

#### 参考文献:

- [1] MCKAY A. Tibet and the British Raj: the frontier cadre 1904-1947[M]. Richmond: Curzon Press, 1997: 35.
- [2] 大英图书馆东方和印度事务部档案 (the British Library, 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 L/P&S/7/183-168, O'Connor to White, 23 November 1905[Z]. 伦敦: 大英图书馆.
- [3] 伍昆明. 英印政府分裂中国西藏的阴谋与九世班禅赴印[J]. 民族研究, 1999(1).
- [4] 庄建平. 近代史资料文库: 第三卷[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
- [5]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等.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 第四册[M].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4.
- [6] 西藏社会科学院, 等. 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史料选辑[M].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6.
- [7] 多杰才旦.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 下[M].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5: 776.
- [8] 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3.
- [9] 陈庆英, 邱熠华, 王维强. 英国外交部涉藏档案选译: 三[Z]. 北京: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所, 2005.
- [1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西藏亚东关档案选编: 下册[M].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6: 978.

① 参见大英图书馆东方和印度事务部档案 (the British Library, 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 之 MSS Eur F197-145, Younghusband to his father, 19 July 1903.

-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清末十三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161.
- [12]陈庆英,邱熠华,王维强.英国外交部涉藏档案选译:四[Z].北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所,2005:420.
- [13][英]黎吉生.西藏简史[Z].李有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79:77.
- [14]周伟洲.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191.
- [15]国风报馆.国风报:五[M].北京:中华书局,2009:3544.
- [16][英]查尔斯·贝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Z].冯其友,等译.拉萨: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1985.

## A Study of the Ninth Panchen Lama's Going to India between Chinese and Britain Archi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Connor's Propositions and Activities in Invading Tibet

LIANG Zhongcui

(School of His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British archives, the Panchen Lama with the intention of escaping, ha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O'Connor. Actually, under the arrangement of O'Connor who played a big role in the incident, the Panchen Lama went to India and became the first Tibetan religious leader who fled to a foreign country. The ninth Panchen Lama's going to India was not only a demonstration of the huge energy of the frontier official, but also an attempt of Britain to win over the Tibetan civil religion upper class.

**Key words:** the Ninth Panchen Lama; O'Connor; Tibet; India

(责任编辑:江 雯)

### (上接第 51 页)

- [10]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63.
- [11]韩德培,马克昌.法理学[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66.
- [12]沈宗灵.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469.
- [13]蒋德海.立法与法的系统化[N].检察日报,2005-09-05(3).
- [14]洪银兴.反哺农业、农村和农民的路径和机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97.
- [15]崔立新.工业反哺农业实现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9:43.
- [16]王学忠.美国、日本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立法的经验与借鉴[J].科技与法律,2009(2):18-19.
- [17]赵谦.我国农村土地整理法律责任立法:不足与完善[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74-79.

## Thoughts on the Legisl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ck-feeding Agriculture in China

ZHAO Qian, XU Heng

(Law School,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6, China)

**Abstract:** Constructing an effective mechanism is the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ck-feeding agriculture as a relatively complete legislation for it is a prerequisite, and the modification of the law of agro-technique extension is only an initiation. The method of formal logic can be applied to discovering the collaborative basic elements for the legisl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act and legal relationship. The legisl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ck-feeding agriculture with the new edition of agro-technique extension law as its core has been basically completed, but in prospective legal effect and systematization of law, there remain problems affecting its operation.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new edition's prospective legal effect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ystematization of provisions are based on the clarification of legal act and legal relationship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ck-feeding agriculture.

**Key w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ck-feeding agriculture; law of agro-technique extension; legal effect

(责任编辑:董兴佩)